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如何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周正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对广大农村来说，就是要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现有文化服务体系的升级版、现代版，又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农村版、农民版。农民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和受益者，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着力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由“盼”文化向“办”文化的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广大农民经济上富起来了，不愁吃不愁穿，求知、求乐、求美成了农民的普遍愿望和期盼，不仅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当代农民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要俏”，需要通过文化美化生活，追求时尚，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美好；“要笑”，需要享受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服务，笑逐颜开，快乐开心；“要跳”，需要唱歌跳舞，参与文娱和体育活动，愉悦身心；“要闹”，需要热热闹闹，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及服务，痛快地抒发感情；“要造”，希望得到公益性文化的学习和培训，造就新的素质，提高致富的能力和本领。这就要求政府与群众上下结合联手办文化，将期盼和需求变成现实。办文化，农民要唱主角，充分激发农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热情。政府主导，农民主办，是发展繁荣农村文化的基本方向。政府应主导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资源配置、设施建设、服务内容，以及人才、技术和政策保障等各方面的工作，承担第一位的责任。要按照业余自愿、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要求，利用农闲、节日、集会，广泛开展农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各种文化活动。同时，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办农民书社、文化专业户、文化大院、电影放映队、农村业余剧团等，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如果只“盼”不“办”，有要求，没行动，繁荣农村文化就会落空。

由“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去主要是采取“送”文化的形式，如送戏下乡、送科技下乡、送电影下乡等为农民服务。这种送的形式不仅要保持并加大力度和覆盖面，同时要更注重“种”文化的形式。即在农村“种”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种子，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送”是引导，“种”是根本；“送”是暂时，“种”是长远；“送”是雪中送炭，“种”是锦上添花。如果只有政府“送”文化，没有农民“种”文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缺乏持久生命活力的。“种”文化首先要培育农村文化人才。由农村自办文化必须有人来办，有较专业、农民欢迎的文化人才。要重视和培养各类文化人才，如农民演艺人员、画家、歌唱家、文艺创作人员、民间艺人等。同时，要积极培育新型农村文化主体，支持农民兴办各类文化团体，鼓励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分子，扶持乡土文化能人，为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夯实基础。而且，还必须建立农民自办文化的长效机制，如建立组织机构、设立相关制度、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经费支持，提供必备的保障措施和条件，使农村文化活动能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由“借”文化到“掘”文化的转变

农村文化活动不能只简单借用或复制城市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而应当深入开掘本地的文化资源和项目，保持农村文化的本色和特质。现在我国许多农村的文化建设大体上都模仿城市文化的套路，把城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简单搬到农村来。城市流行什么，农村也追逐什么；城市热衷什么，农村也力推什么；城市忘记什么，农村也缺失什么，造成城市、农村文化建设“一窝蜂”“一斩齐”的现象。比如，简单把都市白领喜欢的电影搬到农村，把城市的娱乐文化、休闲文化、对歌星的追逐、搞笑等也搬到农村；把明星演唱、歌舞节会等也移植到农村。这固然有缩小城乡差距的一面，但总体上，由于缺少乡音、乡风、乡韵，农民对此并不真正认同和感兴趣。这些脱离农民实际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多因深受城市文化的“浓妆艳抹”而很难在农村流传。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要由“借”文化转到“掘”文化上来。事实上，各地农村都有丰厚、数不清的文化资源、项目、名品等可供开发、挖掘和利用。开发本地的文化资源，如剧目、歌舞、年画、习俗、工艺等，形成特色文化产品，可以大放异彩；开发挖掘文化项目，如乡土文化体验、民族文化寻根、文化休闲旅游等，不仅农民需要，也会广泛吸引具有乡愁情结的城里人；开掘本地的文化精神和优良传统，如晋商的诚实守信、辛劳勤奋，浙商的经世致用、义利并生，徽商的励精图强、不畏艰苦，粤商的自由开放、务实创新，以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等，可形成本地独特的文化软实力。

由“乐”文化向“用”文化的转变

农村公共文化具有娱乐和教化等多种功能。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对其教化育人功能重视不够，而文化的娱乐功能被过分放大。文化被诠释为乐一乐、笑一笑、闹一闹，轻松一下。比如，在有的农村，一些经典无人问津，流行通俗文化却大行其道；歌厅、卡拉OK室、娱乐室、棋牌室等人声鼎沸，而图书馆、文化馆、农家书屋等却形单影只；低俗表演、网吧电游等游走农村街头，但严肃文化、经典剧目、高雅艺术却少有市场。因此，提升农村文化的质量和品位，需要努力实现由“乐”文化向“用”文化的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的教化和培育。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以及法制的宣传普及，在村民中开展评选“致富能手”“好媳妇”“孝星”“文明之家”等活动，引导农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和谐人际关系，推动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普及。农民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学到很多致富实用技术、科学种田知识、网络信息知识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卫生等各方面的知识，从而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乐”文化和“用”文化并非割裂，可以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行。农村文化建设的娱乐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难以吸引农民参与；但仅仅有娱乐是不够的，必须牢记其根本，充实文化内涵，用文化教化人、培育人，从整体上提升农民的素质。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

一次净化灵魂的旅程

——赴河南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培训侧记

□郭鲁江

近日，在中央党校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下，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河南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集中培训。培训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天半，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是一次深刻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教育，是一次净化灵魂的旅程。

第一天上午，我们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了简单而郑重的开班式。开班式后是现场教学。我们在学院教师带领下，集体参谒焦裕禄烈士墓并敬献花篮。在纪念馆，老师为我们上了第一课——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一生，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立体直观地接触焦裕禄事迹，大家的敬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在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泡桐树下，聆听了他与泡桐树的故事，聆听了当年与焦裕禄一起挑起第一担淤泥，战天斗地、治理风沙的魏善民老大爷的动情讲述，听着听着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很多人都忍不住流下热泪。这一天下午，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秘书长、郑州大学教授曹振宇，作了题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及时代价值》的专题讲座，为大家系统梳理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讲解了新时期如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等。

第二天，我们在黄河故道东坝头，了解了黄河九曲十八弯最后一弯的宏大气势和曾经的凶险，听取了当年兰考“三害”的形成和危害程度的讲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焦裕禄就任兰考县委书记时所面临的困难和严峻形势。在张庄村，了解了焦裕禄依靠和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近距离接触了沙丘遗迹——已被当地群众保留下来并栽种树木固定好，以志铭记。在中州民族乐器厂，了解了在焦裕禄身后，泡桐树不但为防风固沙起到巨大作用，更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可观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午是分组讨论，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讲述了所学所感，表达了对照焦裕禄、学习焦裕禄，为党校事业发展做贡献的思考和打算。晚上，我们观看了新闻纪录片《我眼中的焦裕禄》，透过珍贵的历史镜头和当事人的深情讲述，了解了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的真实景象，以及50年来兰考群众对他的不尽追思。

第三天上午，开封市委党校李永成教授为大家作了题为《焦裕禄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专题讲座，从“焦裕禄对群众路线有很深信仰，焦裕禄贯彻群众路线有很高境界，焦裕禄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好方法，焦裕禄贯彻群众路线有伟大品格”四个方面，深刻阐释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实质及其与党的群众路线高度契合的关系，把大家对焦裕禄精神的感性认识进一步系统化、理性化。

这次培训，通过现场讲解，专题讲授，实地参观，分组讨论等形式，向大家立体、全面地展现了焦裕禄同志在“最苦、最穷、最难”的恶劣条件下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发展生产的历史画卷，大家直观深入地了解了焦裕禄同志的不凡历程，亲身感受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授课教师的精彩讲解和对那段历史充满感情的点评，使我们的思想不由地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间切换，有时仿佛也融入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有机结合的方式，使我们对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矢志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什么是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的实干精神，什么是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以及如何在新形势下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逐渐有了形象的理解和较深刻的领悟。短短几天，我们心灵深处不断受到震撼，听党话、跟党走，献身党校事业的热情不断被激发。同时，结合本单位、本岗位的工作实际，也引发了我们许多思考。我们认为，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应重点抓住以下五个方面。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裕禄那样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学习他，就要牢记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始终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裕禄那样真抓实干。学习他，就要脚踏实地干工作，坚持查实情、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特别要发扬不怕困难、勇于尽责、敢于探索的精神，只要瞄准了目标，就扑下身子一项一项地抓紧抓实，以工作作风的不断改进为党校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裕禄那样敢于担当。学习他，就不能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困难往后退，就不能拈轻怕重、明哲保身，就要像焦裕禄那样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对一些大事、难事、棘手事，要深入实际，直面困难，想方设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廉洁自律。学习他，就要时刻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用焦裕禄精神校正自己的言行，实践自己的承诺，坚持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干事，努力做一个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好干部。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学习他，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他的崇高理想和坚强党性，在工作中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把焦裕禄精神当作检视自己的镜子，常补理想信念之“钙”，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作为党校的青年人，通过这次学习，更加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更加感到要切实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学、细照、笃行”要求，真正把学习上的收获转化为指导工作、改进作风的实际行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办公厅）

校园生活

有趣儿的农耕诗

□陆 钦

古老的中国，长期以来农牧兼存，写农的诗词不乏佳作。例如，唐代反映农耕方面的诗作就有李绅的《悯农二首》、刘禹锡的《插田歌》、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的《野老歌》、聂夷中的《伤田家》等。但历代帝王，除康熙帝、乾隆帝之外，很少有帝王描写农耕。《龙之吟——中国历代帝王诗词》第1685页有乾隆帝的一首意味颇浓的《农耕好》：催耕布谷鸣林曲，辰吉相将事力田。井井鳞塍来饁女，子牵童抱绕身边。这首诗是说，春天到了，杜鹃在林间放声歌唱，似乎在催促农耕；大好农忙时节，农夫陆续在田间辛勤地耕作；到了中午时分，井然有序的田间小路上走来了送饭的女人；于是夫妻相会，子牵童抱，环绕身边。这是一幅亲情浓浓的农忙时节田间地头的场景，多么生动的农耕生活图画。情景交融，语言明快，意味深长。曲、辰，合而为“農”，现简化为“农”；田、井，合而为“畊”，“耕”的异体字；女、子，合而为“好”。连起来便是“农耕好”。离合诗，恐怕是中国汉字独有的，这和汉字的结构有关系，有的偏旁可以独立，合而成字，引出相应的语句。用英文、法文等写不出离合诗。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中，出现了几百位皇帝，留有四万多首诗词，但能把笔墨转向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能把乡村夫妻恩爱的农耕生活描写得如此生动、具体、鲜活、有趣还真的极为少见。在帝王诗词里，描写衣锦还乡的场面相当壮阔，描绘四处征伐的局面也十分激烈，至于游山逛水的闲情逸致、花天酒地尽情享乐的场景、君臣互相吹捧唱和尽兴的情结，比比皆是。唯独描写劳苦大众小人物，非常稀少。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传统的夫妻恩爱、贤妻良母的主题，这是古老的中国特色。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男外女内、共同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是义不容辞的天职。这个妇人送来的不仅仅是合乎丈夫口味的午饭，而且带来了家庭的温暖，子牵童抱，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它反映了家庭的和谐美满。如果把这首诗放在《全唐诗》里，并不逊色，可以以假乱真。有人讲，“《全唐诗》里的任何一首诗都超过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诗。”这话说得太绝对。一、此人大概没有通读《全唐诗》，没有发现《全唐诗》也有一般水平的；二、此人大概没有通读乾隆帝的全部诗词，没有发现乾隆诗也有写得好的。例如，《全唐诗》里有这样的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首诗比较一般化。如果一定要把这首诗和乾隆的《农耕好》做个对比，我还是欣赏乾隆的这首诗。因为后者更接地气、更有灵气、更有生活气息。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农耕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外狭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它描绘了农耕的辛劳，披星戴月，夕露沾衣，但没有看到乡间老幼之间的感情世界。宋代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首诗的笔墨烘托出了农忙的紧张气氛，有共性而少个性，是群体形象。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写夏季的农村生活：“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很有韵味，把农家儿女的辛勤劳作反映得比较具体形象，接地气，较真切，可圈可点。而上面介绍的乾隆的这首诗，有渊明之清俊淡雅、翁卷之简洁真切、成大之鲜活灵动，堪称乾隆诗中的佳品。它经得起历史的、实践的、文学的考验。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文史天地

文化的年轮

□苏志加

和人一样，每棵树木，都有自己的年龄计算方式，它无需人来推定，而是自己述说；一环一轮，疏密间也决定了自己一展身手的将来。这好像和我们述说的主题相去甚远，其实不然，文化也一样，也有自己的计龄方式；坐落于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一座在述说自己生前身后历史的同时，作为凝固的时间，绵延流转为文化的年轮。

十多年前，还在大学的时候，听到赵传的那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时只是为他高亢的嗓音、忧伤的味道所“震服”，其中自然也包括时下新鲜的流行元素；只是到了这把年纪，才忽然地感受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肤浅，——“在钢筋和水泥的丛林里”，道出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反思，也道出了现代性的落寞和孤寂。主导20世纪的工业文明，作为其重要特征的分工，它所实现的简单化、齐一性，使每个人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相同部分，丰富的个体性最后符号化为《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它所简单化的还不只是人，甚至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部分。回到那首歌，工业时代的建筑也简单化为两者的集合——钢筋和水泥；如果说有其他的什么变化，几处的变化中也难以挥去纽约、巴黎、东京建筑的影子，那里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建筑范式的张力中心。

我国的建筑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也许重复这样的话，很多人不高兴，但是，“明清以后无建筑”，是否是个事实，可以散见于凋落各地的“推陈翻新”。建国后的很多建筑打着“中西合璧”的名号，其实很多就是钢筋和水泥的集合，而且外形上屡试几何的方型图而不爽。至于建筑单体与建筑群体的差异、序列问题，建筑物与外部环境整体间的互构性问题，建筑与城市的功能甚或结构与审美间的兼顾等等，则更是一种奢谈。“明清以后”没有建筑并不可怕，至多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形式和建筑审美风格发生断裂或缺失，可怕的是我们的建筑不再述说自我的历史，却成为西方文化年轮上的赘生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度的不同建筑，在履行自身功能的同时，也述说着一个文明的特性和文化的变迁。我们不是建筑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无法就建筑本身或建筑的意义问题给出更多的建设性观点。但是，仅仅从记忆中抽取以往的习得也不难发现，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不同朝代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从中还可以触及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安的半坡遗址，那些木架构遗址不仅使人联想起“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五蠹》）”“上者为巢，下者营窟”（《孟子·滕文公》）等神话性的史料述说，还可以知晓一个文明初期的生存状况，看到人类早期的居住文化和墓葬俗成，以及它对今天的文化所形成的种种影响等；再有，杜牧的那首“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仅14个字，不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1400多年前的江南烟雨春景；同时，矗立于苏州城西枫桥镇的、四百八十分之一的寒山寺，不啻为“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南史·郭祖深传》）的时间化石，也为我们诉说着南北朝时那段东行转盛的佛教文化史；更有万里长城，除了作为民族的象征，同时作为世界国防工程的缩影，诉说着我国春秋以降冷兵器时代的国防史。

现实往往比文化的化石更为冰冷。前段时间北京的“会馆拆迁”问题，引起网络一片热议。会馆作为一个建筑群体，同样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时间凝固，看到它，也就看到了明、清两朝以后的乡谊祭祀、科举会试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民俗和制度文化；不仅如此，每一个会馆作为个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履历，看到安徽会馆就会让人想起李鸿章曾是它的力推者，由此延伸并可能浮现于我们脑海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看到绍兴会馆才会知晓鲁迅曾是那里的过客，由此我们会联想到那个长有一字型胡须的新文化运动主将；看到浏阳会馆就会想起“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由此而呈现出戊戌六君子的历史群像等等。与发生在京城的现象相反，有很多地方正在充分地保护和开发“会馆文化”，如广州地区为“加快广州丝绸博物馆的建设”，而计划将广州丝绸博物馆放在锦纶会馆之内；扬州则大力推介“明清古城会馆产业”；而潮安会馆设宴140桌与同乡欢庆，为的是纪念潮安会馆建成46周年。而北京琉璃街、潘家胡同内的任何一个会馆，凭它们的“年纪”是否都值得过上一次这样的周年庆典，而不是在这场“拆迁运动”中灰飞烟灭？

这种担忧绝非呻吟于无病，而是类似的文化印记正被周而复始地抹除。

号称“长城之父”的楚长城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2010年3月，历经考古专家一年多的调查，分布于河南境内25个县区的楚长城的分布线路，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正是通过这些古代建筑，民族的记忆回到2600多年前才得以可能；通过这些历史遗迹，我们才找回了遗失已久的文化记忆；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有关楚长城的研究，才得以从以往的历史文献研究、演绎推理研究转向实地的考察研究。但令人惋惜的是，时隔一年之久，“长城之父”也不得不为一些电力项目或“荒山绿化”等“发展”行为“让路”，已有多处成为了文化碎片。

不知道我们家国内这些尚存的古代建筑，是否也像“欧洲遍布着哥特式建筑的珍品，它们使数代人看了个够”（阿尔弗雷德·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已经让我们的国人感觉“饱得发腻”，而产生了审美疲劳？这里，我们不是针对“‘饮冰室’会馆拆迁”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不是针对“楚长城”的未来宿命，更不是想给辖区的政府部门增加麻烦或施加压力。我们担心的是在这样一种“发展”的国家话语下，那些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发展派”，曲解了科学发展的真正意义。

如果当前这场“拆迁运动”所进行的“拆迁”文化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必然会在不断的重复中而强化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并形成一种新的“拆迁文化”。而在这样一场运动过程中，拆掉的将不仅仅是会馆、楚长城等建筑本身，同时抹掉的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年轮。

（作者单位：铁道党校）

随 笔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